

# 豎義綴文，事詞錯出——論何良俊《語林》 對《世說新語》文體的因革

鄭幸雅\*

## 摘要

何良俊（1506-1573）於嘉靖29年（1550）所完成之《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文體結構有所審視，在文本的話語系統與編碼方式的辯證間，做出相應的變化與翻新，使得《世說新語》的文體結構有所發展。本文以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因革為研究課題，採取文學文體學的視角，爬梳《語林》在類目與門類小序所涵攝的敘事問題，借助語言學的工具性，釐析《何氏語林》的敘事模式，指出文體支配性規範的移位，掌握《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轉化的迹轍。何良俊《語林》強化垂訓的內容題材，透顯名教與歷史意識，衍生以事詞兼攝的語體特性，帶來明代「世說體」側重實用的先聲，向傳統史傳徵實的紀事目的回歸，逐漸遠離《世說新語》語言簡約玄遠、爾雅有韻的意味，轉化了「遠實用而近娛樂」的文體性質。文體是一種變動的存在，其發展變化是一種漸變的狀態，何良俊《語林》文體的轉化，屬於《世說新語》文體內部的調整，此一轉化，將其後之世說體的編撰，領向備一代之遺的史學之途。

關鍵詞：《世說新語》、《何氏語林》、文體學、世說體、經世脩德

---

\*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 Upright Meaning in Literary Composition and Interplay between Affairs and Terms: He Liangjun's *Yulin* and its Innovation of Literary Style towards *Shishuo Xinyu*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Cheng Hsing-Y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Yulin*, completed in the 29th year of the Jiajing reign (1550) by He Liangjun (1506-1573), has carefully examined the structure of literary genres within *Shishuo Xinyu*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It also makes corresponding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ishuo* styles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process between the text's linguistic and categorical encodings on the literal vers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stylistics to concurrently explicate the narrative subject matters on the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prefaces of categories in *Yulin*. Also, with the aid of the instrumental usage of linguistics, it elaborates on 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He's *Yulin* to point out the transfer of dominants in literary genre, and to bring out the track of stylistic derivation in *Yulin* toward *Shishuo Xinyu*. He's *Yulin* aims to consolidate the substance of ethics to manifest the norms and historical conscience, therefore concurring with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Shi* (affairs) and *Ci* (terms). Furthermore, this work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place emphasis on the pragmatics of *Shishuo* Styl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o echo back to the narrative purpose of historical treatise and biographical facts, which gradually keeps the stylistic feature aloof from being concise, thought-provoking, elegant and connotative in theme in *Shishuo Xinyu* - shifting the prevailing stylistic nature of "not

being for the pragmatic purpose, but just for pleasure instead”. With the nature of changeable being, the derivation of literary genre in He’s *Yulin*, falling into the same category of inner adjustment of *Shishuo Xinyu*, is somewhat a process of gradual change. And thereafter, the stylistic variation has led the compiling and writing of *Shishuo Style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for a good prospect of a new age.

**Keywords:** *Shishuo Xinyu*, *Yulin*, stylistics, *Shishuo Styles*, Cultivation



# 豎義綴文，事詞錯出——論何良俊《語林》 對《世說新語》文體的因革\*

鄭幸雅

## 一、前言

《世說新語》是一部成於眾手之作，編撰成書後，卻有著一貫風格，兼具歷史與小說的意味，形成獨特的文體。各朝對《世說新語》理解的層面不一，或側重史學質素借以修史、或傾心於獨到的語言藝術，於創作著述之中，加以發揮、或直就《世說新語》特具的文體，加以續仿成書，形成「世說體」的作品群。<sup>1</sup>《世說新語》富含文化信息，不論就史學或文學的特性觀，隨著時代的遞嬗，各時期不同的讀者，植根於個人的意識型態，產生各異的期待視野，孕育出多元的文化義涵，其經典性是不言而喻。

明代形成一股續仿《世說新語》的熱潮，作品之多居各朝之冠。<sup>2</sup>何良俊（1506-1573）於嘉靖 29 年（1550）所完成之《語林》，在文獻、文體、美學、文化以及語言諸層面，皆對《世說新語》有所因革。它不但是明清時期首部「世說體」的作品，而且樹立明清「世說體」創作的典範，對「世說體」作品的影響深遠，其價值與地位僅次於《世說新語》。

---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之成果。計畫編號：NSC99-2410-H-343-032。

<sup>1</sup> 《世說》以志人為主，獨特的編撰體例和記述方式，形成一種有別於其他筆記小說的結構方式，在文體學與美學上具有獨特的表徵。歷朝習仿之作眾多，形成一個特殊的作品族群，這些族群統稱為「世說體」作品。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十一「世說體」及其文化蘊含〉，頁 284-304。

<sup>2</sup> 張雅函：《何良俊〈語林〉文化意蘊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附表（七）歷代「世說體」作品體例簡表〉，頁 137-138。

明代對《世說新語》的關注，涉及文體性質的考辨，尤其是文與史的問題、語言藝術、劉孝標注、清談誤國、魏晉風流等層面的問題。<sup>3</sup>其中語言藝術的問題，是有明一代關注的焦點。如吳瑞徵於萬曆 24 年（1596）所刊刻的巾箱本《世說新語》，便於序文指出，《世說新語》「語言為宗」、「昭一代之尚」、「成一家之言」。並對《世說新語》的語言加以歸納詮解，分別就立言之宗旨、技巧、原則以及境界加以論述，認為《世說新語》語言具有雅言、捷言、形言、反言、偏言以及超言六義。<sup>4</sup>

何良俊《語林》為明代世說體的典範之作，所關注的《世說新語》課題，側重在文體與文化層面，尤其是文與史，以及語言藝術的問題。<sup>5</sup>陸師道於〈何氏語林後序〉指出四點：一是《世說新語》的載述，言之有據，實可謂良史，不應歸入小說家。二是指出《語林》廣加搜抉，翦裁屬比，嚴約整潔，不下《世說新語》。三是《語林》中的正文與注文，出於何良俊一人之手，其精絕「視之劉氏，富瞻略等，信談洽之鉅觀，而文筆之弘致也。」四是關於時人對《語林》「多取近世漢家，頗傷玄雅，而又以鞞譯之士廁之中古華夏，幾不分虎羊之羈為疑」的評議，陸氏則提出「元朗之志，托於法戒，則不得不兼取久近而具列焉」的意見。<sup>6</sup>

陸師道〈何氏語林後序〉在肯認《世說新語》史家性質的前提下，視何良俊所編撰之《語林》，其文即史，而且文筆弘致。至於元朗自謂《語林》之敘言語篇，玄虛簡遠，不得盡同劉氏，陸師道則言「覽者可自得之」。何良俊《語林》的語言，為了存故實、垂法戒，辭多浮長的狀況，時人褒貶不一，其中以王世貞「事詞錯出不雅馴」的評議最為著稱。王世貞於〈世說新語補序〉直言：「最後得《何氏語林》大

<sup>3</sup> 鄭幸雅：〈論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的文化意蘊〉，收入於殷善培主編：《文學視域》（臺北：學生書局，2009），頁 538-546。

<sup>4</sup> 明·吳瑞徵：〈世說新語敘〉，收入於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吳瑞徵刊刻之巾箱本），卷首。

<sup>5</sup> 本文所言的「文體」指涉，採取陶東風所言：「文體是文學作品的話語體式，是文體的結構方式。」見於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2。至於拙作〈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一文，乃是就《語林》之編輯體例、體裁的規範加以探討，未及語體的創造與風格的追求。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文學新論》10（2009.12），頁 105-166。

<sup>6</sup> 明·陸師道：〈何氏語林後序〉，《何氏語林》，卷末。收入於新興書局編：《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十七編（臺北：新興書局，1984）。

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詞錯出不雅馴，要以影響而已。」<sup>7</sup>文中揭示《何氏語林》所載述遙承六朝風旨，有可稱者，但對《世說》語言之長則未知，故有「事詞錯出不雅馴」之評議。隨著《世說新語補》的廣為流衍，致使《世說新語》的語言藝術備受關注。

何良俊編撰的《語林》，在唐宋時期續書作者關注社會政治的基礎上，雖以《世說新語》的分類精神為標準，增廣魏晉以後的文獻，依仿《世說》的類目加以編定，但並不以人物品評為敘事的唯一目的，而是展現個人對史傳徵實錄目的的側重，致使《語林》彰現的文體、敘事精神，與《世說新語》有所不同。<sup>8</sup>任何一種文體都不是靜止、一成不變的抽象物，《世說新語》亦然。隨著歷朝對《世說新語》的續仿所形成的「世說體」，它隨時間而發展變化，隨空間而有所不同，文學體式既有歷時的變化，也有共時的差異。<sup>9</sup>

何良俊《語林》的編撰，乃是在「世說體」作品的擴增中，思量文與史、詞與事之間的協和，尋求一個最佳的《世說新語》文體典範。何良俊在長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對《世說新語》文體特徵的心理把握，對於文體慣例有所認識，即便產生《世說新語》的文體意識。由於每一個創作個體對文體規範有反思與選擇信仰的自由，或依據形式規範形成結構方式；或依據題材內容、描寫對象，選擇特定的語言形式，通過建構與解構的存在方式，使得文體居於一種不斷變換的狀況。<sup>10</sup>《世說新語》的文體亦然，在歷史的長流中，《世說新語》在歷朝「世說體」的創作積累下，映現文體的變化與延續。

本文以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因革為課題，乃是基於〈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一文，已對《語林》之編輯體例、體裁的規範有所掌握之後，對《語林》之語體與風格加以尋繹。前文指出何良俊在倡博雅而主於經術的主體意識下，通過類目的設置、類目序文的書寫、論議的

7 明·王世貞：〈世說新語補序〉，收入於明·王世貞編，張文柱校：《世說新語補》（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萬曆13年張氏原刊本），卷首。

8 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49。

9 劉偉生：〈世說體研究的文體學意義〉，《學術界》3（2009.5），頁196。

10 陶東風：〈結構轉化與文體演變〉，《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頁28-40。

批點，在既定與變化的情形中，標舉經世為經、適性為緯、德行為基調的主體編撰意識。〈召喚經典〉一文指出《何氏語林》在體裁方面，通過不同常規慣例的組織，構成反映對象，越過《世說》既定的視野，從而獲得了一種新的詮釋視野，為《世說》之經典性增色。本文則在體裁因革的基礎上，進而探究何良俊所知悉《世說新語》文體的常規慣例，在主體的意識和意願的意向性行為下，形成怎樣的文體規範？何良俊《語林》的編撰，又對《世說新語》文體產生怎樣的建構與解構？故本文便以「豎義綴文，事詞錯出——論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因革」為題，探究何良俊《語林》在尊體與破體之間，如何奇出以為用。

本論文對何良俊《語林》文體的探究，主要採取文學文體學的視角，藉由語言學的途徑，兼及《語林》文本的闡釋，探討何良俊如何通過對特定語言的選擇，表達和加強《語林》的主題意義和藝術效應，對《世說新語》文體有所因革。<sup>11</sup>針對何良俊《語林》文體的課題，主要的研究進路有三：其一由類目設置與門類小序看何良俊《語林》所涵攝的敘事問題，考察《語林》的敘事態度、視角取向以及敘事原則。其二由「詞序」觀點理解《語林》的敘事方式，藉由語言結構的分析，尋繹何良俊《語林》中所做的特定語言形式的選擇。其三由支配性規範的移位，標誌《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轉化，通過同化與順應的認識，依據形式規範或結構方式，在建構與解構之間所產生文體結構的變革，探究《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延續與創化。<sup>12</sup>

## 二、考察《語林》涵攝的敘事問題

<sup>11</sup> 申丹：〈文學文體學的分析模式及其面臨的挑戰〉，《外語教學與研究》3（1994），頁7。

<sup>12</sup> 本文探討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因革，以《世說新語》為標竿。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之作雖以敘事與語言為研究對象，實則對《世說新語》文體特質的揭示有其功績。故本文探討何良俊《語林》文體問題，頗為同意梅氏的研究途徑，尤其是詞序觀點探討文體的敘事方式，以語言學為工具，可免除純文學主觀而抽象的論述，使敘事方式的探討，更為具體而易於掌握，同時提昇研究的客觀性。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臺北：里仁書局，2004）。

任何一種文體皆含括體裁、語體與風格等豐富的內涵，體裁則是文體中主導性的結構形式，也是文章之所以成體的關鍵。所以探討何良俊《語林》文體的課題，即以體裁層面為始點，尋求其中所涵攝的敘事問題。《語林》的敘事問題，在體裁層面的討論，藉由類目的增加、次第的更動、門類序文的闡釋以及論議的評點，突出何良俊《語林》經世為經、適性為緯，以及脩德為基調的編撰意識，彰著何良俊對《世說新語》體裁層面獨到的理解、詮釋與應用。<sup>13</sup>以何良俊編撰《語林》標舉經世為經、適性為緯，以及脩德為基調的前提下，可藉由門類小序為主，正文與注文為輔的釐析，對《語林》的敘事態度、視角取向以及敘事原則等三個方面加以闡述。

首先，在敘述態度方面，《語林》表彰尊德行，長道業的態度取向。何良俊《語林》以脩德為基調，其於〈德行第一〉的序文有言：

夫孔門以四科裁士，首列德行之目。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也。嗚呼！夫行胡可以為偽，然事變遁陳，雜然泛應。士有百行，焉能以一槩取哉？狂狷殊途，均能屬聖，剛柔異稟，善克則中。百慮一致，要本於德爾矣！<sup>14</sup>  
（卷1，頁1A）

上文雖是〈德行〉門的小序，實則為何良俊編撰《語林》的宗本所在。文中言明士人剛柔之性殊，狂狷之途異，只要本於德，善克己性即能徵聖。故此類目所收者，主要是合於道德之行止，不遺小大，皆可列為〈德行〉載錄的對象，展現《語林》之敘事對德性與道業的尊崇。

《語林》的題材內容言及德行者多矣！文本中如君子貴誠、持之以敬、仁義遜讓、動由禮則、清介有節、循禮勤政、有過能改等詞，不勝枚舉，一再彰著《語林》的德行視角。如《語林·賢媛第十七》所載記賢淑的女子，大多推崇清節有志操，以及具有深識高行的女子，展現《何氏語林》選擇題材偏重女德的取向，此與《世說新語·賢媛》讚賞女子之才智，不採取德行的視角有別。除序文、正文之外，《何

<sup>13</sup> 關於何良俊《語林》體裁的討論，以及編撰準則的討論，可詳參拙作：〈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頁105-131。

<sup>14</sup> 何良俊：《語林》，〈德行第一〉，卷1。收入於新興書局編：《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十七編，頁1A。以下所引《何氏語林》之文，皆從此出。為免冗蕪之累，僅於文末標注類目、卷數、頁數。

氏《語林》注文中載錄攸關尊德行，長道業的文獻不少，其文如僧虔〈誠子書〉（〈德行第一〉，卷2，頁2B）、朱穆〈崇厚論〉（〈言語第二〉，卷4，頁2B）、徐勉〈戒子書〉（〈方正第六〉，卷12，頁28A）等，不憚文獻篇幅之巨，詳備地加以載錄，增添《語林》敘事的德性色彩。

《語林》的敘事由德行的不同側面，昭著德性之綱常，帶著傳統儒家倫理的印記。其於〈捷悟第十三〉的小序，對敘事以德為本的態度，作進一步地說明。其文載：

漢世稱見事敏速者曰：一日千里，蓋言捷也。夫有觸即悟，其孔子所云耳順非耶？然孔子必俟知命之後，而後世小生率能及此，余竊怪之。嘗觀釋氏菩薩乘六度，五者皆以慧為導師，然定復生慧。其與吾儒明則可以至於誠，誠則自無不明，一道也。故初地之慧謂之世諦，既定之慧，謂之真諦，真諦則與理為一，即耳順是也。然初地之慧，本於賦畀；既定之慧，假於脩息。賦畀必由天降，脩習可以力強，此其難易之辯也。奈何後世初地之慧，與古不異，而既定之慧，眇焉無聞，豈人之易其所難，顧難其所易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嗚呼！惜哉！（卷21，頁1A）

上文中對「捷」與「悟」作說明，認為捷者見事敏速，一日千里；視孔子知命之後，有觸即悟的耳順為悟者。文中指明孔子之「悟」非後世小生之「捷」所能及之。接著藉由釋氏初地之慧與既定之慧的類比說明，提出捷者如初地之慧，本由天降之賦畀，實為難得；既定之慧，假於脩息，可以力強而致。文中感嘆人往往不辯兩者之難易，顛倒其間。最後何良俊肯認好學脩習方是進德修業之正道。此說為《語林》尊德行，長道業的敘述態度，作了最佳的注腳。

其次，《語林》的視角取向，展現不廢實用的向度。何良俊《語林》的視角取向，一方面在序文中讚賞《世說》各類目精彩顯示人之生命姿態與形相，而言「不可已」、「何可廢」、「何可掩」。一方面則在兼濟天下的經世企圖下，於《語林》類目中突出經世意識，引生實用的取向。其於〈品藻第十〉載：

昔子貢方人，夫子曰：我則不暇，蓋少之也。及觀夫子之論管仲、晏子、銅鞮、伯華、程本子、蘧伯玉、子產、孟公綽、甯武子諸人。其差次品列，不

遺毫髮，此所謂方人者非耶？而何獨少子貢也。蓋夫子嘗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則夫子何嘗不貴知人哉？然所貴知人者，為其能自考也。不然，知之雖明，奚益哉！漢晉以來，喜人倫，其品目率一二語，皆微中，足以繫人終身，此其人豈必盡能自考有所益？然足使後之欲論其世者，宛然若親見其人，則斯語又烏可少哉！（卷18，頁1A）

文中所言，夫子對人之差次品列，有不遺毫髮之能耐，但方人並非用以議論與談資，應是以知人而能自考為貴，藉由知人自考得以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此乃何良俊依儒家進德修業的實用觀點，看待品藻的活動。除此，何良俊對漢晉以來，人倫品目微中，又足以概人之終身，雖不用以自考，但對後人了解其世之風，得以若親見其人，有所裨益，便直言〈品藻〉之言不可少。

何良俊對《世說新語》類目的設置及其精神，雖多所頌揚，但《語林》的編撰，在經世的意識下，逸出《世說新語》品賞的視野，突出實用的視角取向。〈言語第二〉序文，便直道：

余讀韓詩外傳，得趙倉唐對魏文侯事。歎曰：夫言何可以已哉？排難解結，釋疑辯誣，喻誠通志，協羣情，定國是。使當時無倉唐之言，太子不得立，魏國幾殆。嗚呼！夫言何可以已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正以見言之不可已也。（卷4，頁1A）

文中載明，言之所以不廢，乃在於得體之言，其言不但可以排難解結、釋疑辯誣、喻誠通志、協羣情、定國是，甚或可以救一國之危殆。何良俊此言以經世實用的功能來看待語言，強調君子出言若善，則千里之外必有應者，標舉孔子所言，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的實用取向。《語林》通過門類序文不同常規慣例的組織與論釋，突出實用的標誌，構成鮮明經世意識的映象，越過《世說新語》遠實用近娛樂的傳統視野，轉向實用的開放性革新。

最後，在敘事原則方面，《語林》以豎義綴文，事詞錯出為敘事的圭臬。何良俊《語林》在實用的視角取向下，於〈言語〉序文之後的按語，明言《語林》敘事對事與詞的取舍原則。其文直道：

何良俊曰：余撰語林，頗倣劉義慶世說。然世說之詮事也，以玄虛標準。選言也，以簡遠為宗，非此弗錄。余懼後世典籍漸亡，舊聞放失，苟或泥此，所遺實多。故披覽羣籍，隨事疎記，不得盡如世說。其或隨事疎記，則稍為刪潤云耳。（〈言語第二〉，卷4，頁1B）

文中明言，《語林》之撰述，雖意仿《世說新語》詮事以玄虛為準的，選言以簡遠為宗，但心懷典籍漸亡，舊聞放失之虞慮。故不憚篇幅之冗長，不惜文辭之浮長，載錄許多英雄賢聖事跡的傳聞、世家譜系的記憶、描述世外桃源或邪惡世界的故事，藉以保存文獻故實。其例如《語林·假譎二十九》「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卷29，頁2B）一文，則由兩位宰輔各懷疑阻說起，細書姚崇遺言戒諸子，如何應對張說，方能得到張說所書之神道碑。此文不憚冗長地敘述事件之本末，以存舊聞故實，以彰假譎之旨。另如《語林·排調第二十七》「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卷27，頁35B）一文，其前半段所言為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而富達，後因子孫相爭，致使髑髏被斧成碎片；後半段方進入張文潛排調之語。就語體而論，若語言欲同《世說新語》清簡淡遠，則正文不宜列入安氏之世家譜系的記憶。但何良俊不願放失故實，欲全事件之始末，並藉此映襯後半段排調意旨之明晰，故不惜文辭之浮長，列入安氏家事始末。《何氏語林》依此原則的撰述，所形成之語體與《世說新語》簡遠為宗的語體風貌有所不同。

《世說新語》載錄的材料向為史家所重，表述的手法又為文學家所推尊，使得世說體既有史學性又具文學性。《語林》在經世為經、適性為緯、脩德為基調的編撰意識下，引伸不廢實用的視角取向，為保存文獻故實，不惜以事破詞，不但形成與《世說新語》簡遠為宗的語體風貌有異外，而且使得《語林》文體於史學方面的意味有所增長。

何良俊對於經史之學自有其主張，尤其對史學有所偏嗜。<sup>15</sup>何氏所著三十八卷《四友齋叢說》中，論史者即佔了十二卷，篇幅之鉅，可知對史學多所側重。《語林》的敘事在何良俊的史學熱忱下，不但呈現事詞錯出的原則，同時關注這些事蹟背後的意義。其於〈文學第四〉道：

<sup>15</sup> 吳智和：〈何良俊的史學〉，《明史研究專刊》8（1985.12），頁1-98。

仲尼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二，而以文學顯者二人，可不謂難哉！子夏序詩，與六經並垂宇宙，何可掩也！獨子游無所考見，說者以為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嗚呼！夫文與義，皆天地之蹟也，苟非得其精華者，曷足以與此。後世言有枝葉，若與古少異矣！然覽其豎義綴文，理榦辭條，蔚然並茂，非有義根，曷從生哉？枝葉雖繁，又烏可少也。余故摭其最者，著之篇，使來者得以觀焉。（卷 7，頁 1A）

文中首先肯定文學之為難以及不可少，進而言及文與義皆是天地最幽深難見者，兩者之關係，視言為辭條，其能蔚然華茂，乃是以義為根，以理為榦，所以何良俊於此標舉豎義綴文。《語林》中「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先生學」（〈德行第一〉，卷 3，頁 27A；家殮其師俞觀光先生事）、「龐士元性好人倫」（〈識鑒第八〉，卷 15，頁 8A；人倫品藻可興風俗、長道業、崇邁世教）、「貞觀中，百官表請封禪」（〈箴規第十一〉，卷 19，頁 13A；魏徵諫太宗罷封禪）之正文，以及「曲端為涇原都統日」（〈政事第三〉，卷 6，頁 29A；論曲端之死與直筆之難）、「周勰為謝太傅主簿」（〈方正第六〉，卷 12，頁 17A；王坦之與袁宏辯謙之論）等注文，凡此皆是視言為辭條而以義為根，以理為榦之敘事。何良俊編撰《語林》以豎義綴文，事詞錯出為敘事之原則，便合此而生。

何良俊《語林》所涵攝的敘事問題，在經世為經、適性為緯、脩德為基調的編撰意識下，衍生尊德行，長道業的敘述態度以及豎義綴文，事詞錯出的敘事原則，譜成實用與賞心的二重奏，而以實用為主旋律。

### 三、理解《語林》的敘事方式

每一文學體類的作品，在敘事方式上總帶著普遍被接受的群體特徵，以及個體的變異特質，通過協和傳統敘述方式與個體出奇的語言模式中形成文學的價值。何良俊《語林》的編撰，選擇了《世說新語》文體的話語框架，其於敘事方式自然受其限制，但基於個人思想情感的牽引，運用特殊的技巧，通過制定模式來增強語言

行為的效果，變異敘事方式，成了創作必然之途。<sup>16</sup>

何良俊《語林》意仿《世說新語》而作，在類目的畫分、語言模式的建置等皆有所因襲與變革。就詞序觀點而言，《世說新語》具有「由整體的結構安排看多種生命形相的呈現方式」與「由個別條目看特定生命形相的呈現」等敘事方式<sup>17</sup>，何良俊編撰《語林》時有所承襲。

首先，就由整體的結構安排看多種生命形相的呈現方式觀，文本中不同類目所載記的內容、同類目不同個體的行止敘事、以及以個人為主軸，糾集不同類目的相關載記，即可呈現個人不同的生命形相，凡此皆映畫出人的多種生命形相。若以張思光為例，觀察各類目所載記張思光的材料，當可窺見多個面向的生命形相。其文如：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思光住在何處。思光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德行第一〉，卷2，頁3A）

張思光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賞譽第九〉，卷16，頁18B）

張思光家貧，願祿，與從叔征北（張永）書曰：融昔稱幼學，……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又語王吏部（僧虔）曰：阮籍愛東平風土，融亦欣晉平閩外。時議以思光非治民才，竟不用。（〈言志第五〉，卷10，頁25A）

上文所呈現張思光的形象，於〈德行〉所載錄為張融（思光）居止清簡安貧的高行；〈賞譽〉載其人清抗絕俗的特性；〈言志〉則記張融因家貧而願祿求仕，為求仕祿之書信，輾轉往覆於多人的謙卑姿態，身段之柔軟與〈德行〉、〈賞譽〉所展現清抗絕俗的高行形象殊異，揭示張融生命形相的另一番風景。《何氏語林》因襲《世說新語》由整體的結構安排看多種生命形相的呈現方式，此乃可見一般。

<sup>16</sup> [英] 雷蒙德·查普曼 (Raymond Chapman) 著，王晶培審譯：《語言學與文學》（臺北：結構出版群，1989），頁1-28。

<sup>17</sup> 關於藉由詞序觀點，探討《世說新語》的敘事方式，可詳參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頁216-223。

其次，由個別條目看特定生命形相的呈現觀，《世說新語》採取有限的全知視角，通過引言、插語、補敘的敘事方式，採取片斷的影像，形成簡明得體的語言，如戲劇的搬演，顯示主角人物當下的言語和行為，形成深具情韻的獨特敘事方式。何良俊《語林》的編撰，不乏此種顯示的敘事方式，其例如：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費用悉焚。昉力完所寄絲，付張氏。（〈德行第一〉，卷 3，頁 25A）

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大喜。（〈言語第二〉，卷 5，頁 20A）

王佛大性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故今世人猶稱大飲為上頓。（〈任誕第二十五〉，卷 25，頁 7B）

上述引文，張昉完里人所寄絲，通過張昉家居、里人寄絲、大火悉焚費用、昉力完所寄絲的簡單片斷，顯示張昉合乎德行的行止。同時藉由開頭「張昉家居」的引語，導引全文的閱讀，彰現後文所言「昉力完所寄絲」的高行。次則蔣之奇既貴條，採取插語的方式，藉由「為六路大漕」官職的插語，彰明其貴以及何以出現在金山寺，得以與了元有所互動。而王佛大嗜酒條，則以「故今世人猶稱大飲為上頓」的補敘方式，除了補充說明王佛大嗜酒之深，飲酒之豪外，同時對上頓之意涵，有所解說，令讀者得以深切領略文中的情韻。凡此皆是承襲《世說新語》的敘事方式，藉由個別條目看特定生命形相的呈現，致使文本產生深具情韻、雋永有味之語體風格。

何良俊《語林》的編撰，採取世說體的話語框架，一方面對《世說新語》的敘事方式有所承襲，運用被普遍接受的敘事特徵來達到特殊的效果。一方面因個人情感思想表達的需要，自然也建置了個體特有的敘事模式，而對《世說新語》的文體有所變異。《語林》變異的敘事方式，主要是由《世說新語》有限的全知敘述，轉變為廣泛地運用全知敘述模式，藉以敘說理論，建立道德標準的信息，彰明經世為經，適性為緯，德性為基調的編撰意識。何良俊《語林》廣用全知敘述模式，可由講述因由標德行、備載文獻存故實、載記行止垂法戒、事詞錯出彰事義四者加以分析。

## （一）講述因由標德行

《世說新語》在有限的全知敘事下，讓文本的主角自行發聲、行動，運用精簡的文字，形成一種特寫鏡頭的效果以及戲劇搬演的形態，展現被敘述者的情感、意志和風姿。何良俊《語林》採取全知敘述模式，則通過講述，將文本人物的情感、意志、心理和風姿，運用起承轉合的結構，進一步縝密文本情節，順此標舉個人的主張與執見。其例如：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一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sup>18</sup>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許令為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堂前，熟識竊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父，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為婢。鍾離君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據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奩筐，先求婚嫁之，更一年別為吾女營辦。許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縣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德行第一》，卷3，頁7A）

上文所引《世說新語》華歆與陳元方事，此中並不言明兩人之情感、意志和風姿，僅藉由閒居時華歆嚴整、陳元方柔愛的特寫鏡頭，對比兩者截然不同的門風，彰著各自的才性風姿。至於上文所引《語林》鍾離君嫁女一文，講述結構的完整與《世說新語》以特寫鏡頭說話的敘事方式，大相逕庭。鍾離君嫁女一文，文中以縣令鍾離君嫁女，買一婢從嫁為全文之起點。接著由婢執箕帚掃地與鍾離君之對話，以及考證婢女之身世，得知其為前令之女為承接。再以鍾氏寄書與已訂婚宦的許氏，言明先嫁其前令之女，後嫁一己之女的打算為轉折。最後以許君共襄盛舉的回信為結尾。文中藉此案例，宣示鍾離君的仁義之心，同時又以許縣令當仁不讓的回應，提出仁義不自專，以標舉道德的必要與當然。《語林》講述因由，標立德行之例甚多，

<sup>18</sup>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3），〈德行第一〉，上卷上，頁12。以下所引《世說新語》之文，皆從此出。為免冗蕪之累，僅於文末標注類目、卷數、頁數。

如華歆封金還客（〈德行第一〉，卷 1，頁 11A）、魏徵勸太宗罷封禪（〈箴規第十一〉，卷 19，頁 13A）、時溥平黃巢亂，獻巢姬妾於僖宗，巢姬妾指陳僖宗治國之失（〈賢媛第十七〉，卷 22，頁 19B）皆是此類。

## （二）備載文獻存故實

何良俊《語林》採取全知敘述模式，在語言的運用中，因不同內容表達的需要，通過不同的組構模式，幻變出不同的語境，形成不同的藝術效果。講述因由標德行的敘事方式，敘事者將個體的熱忱，灌注於文本人物的情感、意志、心理和風姿之中，形成敘事者宣揚德化的合理語境。而備載文獻存故實則採取旁觀冷靜的立場，客觀將文獻存錄備考，《語林》中〈博識第十四〉大抵採取此種敘述方式。其例如：

唐太宗立晉王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侏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侏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大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卷 21，頁 16A）

上文的敘述模組：以大致的時間段或地點為敘事之首，如「唐太宗立晉王太子」、「孫權時」（頁 10B）、「梁太祖幸河北」（頁 17B）。接著以對話或事象的狀況羅織所涉及的博識對象，如褚遂良言雉之雄雌與君上事功的祥瑞之徵、女乳長七尺（頁 9A）、伐桑樹煮怪龜（頁 11B）、三日曲水（頁 12A）等故實。最後是聽聞者大悅或讚嘆言說者之博識，如「帝大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詔賜帛百匹」、「眾乃歎服」、「朝士皆歎其博識」。備載文獻存故實的敘述模式，除了運用於〈博識〉之外，其他如司馬溫公解禪偈六篇（〈文學第四〉，卷 9，頁 15）、虞翻言會稽人文薈萃（〈品藻第十〉，卷 18，頁 4）皆是此類。博識門的敘述模式大抵若是，為《語林》備載文獻存故實類的敘述框架，凡此為《世說新語》的敘事所罕見者。

## （三）詳記行止垂法戒

《世說新語》在有限的全知敘事視角下，文本所載人物言行多為片斷，單詞隻

句卻清雋有意味，如：「謝公始有東山之志」條，不由謝安自身說起出處之道，亦不從高懸清行、節操之說定其行止，而是藉由郝隆「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之言，通過適切的借喻，傳導出《世說新語》清雋有意味的言語（〈排調第二十五〉，下卷下，頁 803）。何良俊《語林》除了承襲《世說新語》單辭只語，清雋可味的片斷敘述外，在垂法戒的實用要求下，條文中所載記的行止，仍以言為主。但敘述的方式是跳脫片斷、情節疏略的樣式，代以詳備載錄當下的對話，致使行止之載記較為整體，情節密度升高。其例如：

卓茂為密令，有人詣茂，言亭長受其米肉。茂問此人：亭長為從汝求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名賢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經紀禮義，以相交接。如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政事第三〉，卷 6，頁 1B）

上文通過卓密收到百姓投訴亭長受饋遺之事，宣揚「經紀禮義，以相交接」、「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為法戒的故事。文中以「卓茂為密令，有人詣茂，言亭長受其米肉」為敘述始點，拉開事件的序幕，引出卓密與百姓的對話。文中人物之對話，首先，以卓密一問，百姓一答的往復方式，指出百姓主動前往詣茂，言饋遺亭長的事狀。其次，提出既是民覺受亭長之恩，故主動饋遺，便不應有言的觀點。在卓密與百姓一來一往的激烈的對話中，鋪設事件的高潮，於文中置入「經紀禮義，以相交接」的法戒之旨。再者，語境由熱烈對峙轉為溫和趨近對方立場的對話，並引出「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法戒意。最後以「人納其訓，吏懷奇恩」為任務之完成，事件圓滿落幕。上文雖以人物對話出之，對整體事件的細節，甚或人物心理皆加以關照，事件完整，對情節無所疏略，並於文中彰著作者藉文以垂法戒之意。《語林》載記行止垂法戒的敘述方式，除卓密事的典型例子外，尚有鍾季明兄弟言國有道不廢，

國無道免於刑戮，保身全家之事（〈識鑒第八〉，卷 15，頁 2A）、沈（友）子正與華歆（子魚）言禮賢，指明仁義有禮，於先王之教有所裨補，方得人文化成，以行風俗之事（〈夙惠第十六〉，卷 22，頁 3A）皆屬此類。

#### （四）事詞錯出彰事義

何良俊《語林》的撰述，在言為辭條，以義為根，以理為榦的前提下，衍生豎義綴文、事詞錯出以彰事義的敘事方式，主要有三個因由存焉：一是文人創作豎義綴文，理榦辭條，蔚然並茂，皆由義根所出的認識。二是懼後世典籍漸亡，舊聞放失，所以隨事疎記，事詞並出，辭便有所浮長。三是基於隋唐以後之文化與漢魏有別，為了載記各朝文士風流、時代風潮之所需。上述三因致使《語林》事詞錯出以彰事義的敘事方式，產生有事有言，記事或多於記言的組構。《語林》記事分量的提升，乃因應彰著事義而生，與《世說新語》記言為主，採取品賞的態度，藉隻字片語以產生有意味的語體型態有所不同。其文載：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言語第二〉，上卷上，頁 120）

范忠宣既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君益知穎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君益，荷公厚意，但上命揭於墓隧，假寵與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為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君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家君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許，語君益曰：頃胡文恭知蘇州時，蔣希魯至政歸。文恭嘗學於蔣，乃表其第為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歆，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時營繕以畢，文恭因嘗獲芝草，遂更為靈芝坊。文恭退而與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言，遂撤范氏之坊。（〈德行第一〉，卷 3，頁 22A）

上文所引《世說新語》簡文召宣武事，此中並不言明桓宣武勢傾朝野，迫及帝位存廢之事，僅以「暗室中坐」、「召」、「上何在」、「某在斯」等隻字片語，以特寫鏡頭，透顯簡文之艱難、桓宣武之威權。至於上文所引范忠宣公忠直坊一事，記事分量的

提升，彰著文本的事義，足為《語林》事詞錯出彰事義的典型文例。范忠宣公忠直坊一文、載記唐君益、范正平以及李端叔三人對立忠直坊的看法，三人皆寄事由於言詞中，形成事詞錯出的典型模式。上文結構概可分為四個句段：開頭三句，言明朝廷賜「世濟忠直」碑與范家之事始。其次，事及唐君益知潁昌，欲立忠直碑於康莊大道，成忠直坊，以宣教化。范正平持議不同，彼此言語往復以釋己意。再次，事情因李端叔官於許，得以加入事件，李端叔借蔣希魯之事以語唐君益，致使事態發展有所轉折。最後，以唐君益撤忠直坊為事件之結局。忠直坊一文，事詞錯出，事中有事，記事詳備，不憚詞冗，以彰著忠直之事義。何良俊《語林》中，李獻甫說夏使（〈言語第二〉，卷5，頁25A）、范景仁與趙閱道私好不協，趙閱道不以私害公（〈方正第六〉，卷13，頁22A）、鄭玄通德門（〈企羨第二十二〉，卷24，頁2B）皆是事詞錯出彰事義的典型敘事。

何良俊編撰《語林》在尊德行，長道業的敘述態度、不廢實用的視角取向，以及豎義綴文，事詞錯出的敘事原則下，所做特定語言形式的選擇，乃是廣泛運用敘述全知視角，突出講述、備載文獻、詳記行止、事詞錯出等敘述方式，強化作者脩德經世的編撰意識，致使《語林》文體逸出《世說新語》片斷與顯示的戲劇舞臺效應，傾向整體與講述的史傳傳統。

#### 四、標誌《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轉化

何良俊《語林》的編撰，在理解《世說新語》文體規範的前提下，形成個體認知後，產生「世說體」的預成圖式。接著依據預成圖式中，形式規範、結構方式、題材內容以及描寫對象的雛形，與《世說新語》的常規慣例相匹配，擇定最佳的語言表達模式。最後通過自我轉化的能力，形成新的常規慣例，樹立新的支配性規範，進而對《世說新語》的文體有所修正。支配性規範的轉移，乃是文體變化與延續的

關鍵。<sup>19</sup>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轉化，可由《世說新語》文體支配性因素的梳理、《語林》文體支配性規範與因素的考察，以及《語林》文體支配性規範的移位，對《世說新語》文體的調節三者加以闡述。

首先，梳理《世說新語》文體的支配性因素，《世說新語》文體的要素與特徵，相關論述甚多。<sup>20</sup>歸納諸家之說，《世說新語》文體支配性因素有四：其一是以志人為主，但仍有少量記怪志異之事。內容材料採擷叢殘小語的故事，篇幅大多短小。其二是採取分門部類的體例，依人而述，品第褒貶。在東漢末年品藻人倫與魏晉談玄之時代風氣下，以品賞人之才性為中心。其三分門隸事，以類相從的編撰方式。每一門類以不同的人物故事為內容，每一類人物故事，表現相同的主題。其四是以語言為宗，《世說新語》語言表現為清通簡淡、空靈玄遠的文體風格。《世說新語》文體支配性因素中，「依人而述，品第褒貶」、「分門隸事，以類相從」為文體鮮明的標誌。《世說新語》以才性品賞遠實用為文體的內核，亦是文體支配性規範之所在。

其次，考察《語林》文體的規範與支配性因素，何良俊編撰《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規範性要素，有認同，亦有所變革。在志人為主的文體因素中，除擷取叢殘小語的故事外，《語林》增加較多史部的材料，記怪志異，荒誕神異之事亦較《世說新語》為多，條文篇幅大致較長。面對「分門隸事，以類相從」的編撰方式，《語林》完全依從《世說新語》的文體規範。

在《世說新語》「依人而述，品第褒貶」的文體標誌下，何良俊編撰《語林》並未全依《世說新語》之舊。由於何良俊具有以經世為經，適性為緯，脩德為基調的編撰意識，便將脩德經世的實用性因素，植入《世說新語》重才性品賞，近娛樂遠實用的文體支配性規範之列。

至於《世說新語》文體的語言問題，王世貞對《語林》的語言，有不雅馴之評議，指出何良俊《語林》之語，未能充分含具清雋有意味的形式，在《世說新語》

<sup>19</sup> 所謂「支配性規範」(dominants)，意指在一組文體規範或因素中，對文體具有支配性作用的因子。陶東風：〈文類演變的文體學透視〉，《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頁 41-85。

<sup>20</sup> 可參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頁 284-304。劉強、吳寅：〈《世說新語》文體考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 (2005)，頁 113。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頁 93-120。

文體語言支配性的因素方面，有所不足。何良俊《語林·賞譽第九》的序文載：

孔子嘗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則孔子但不毀人耳，亦何嘗不譽人哉？然必試耳。余觀東漢喜標樹，晉世好加獎飾，然一時雖門閥子弟，皆賢可施於行列。昔人以為名者，摩世厲鈍之具，豈不信哉！善乎龐士元之言曰：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夫古多善俗，或者用此道也。後世欲以深文苛議，激振頹風，然一遭譏貶，而賢者率多自棄。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加之慮哉！（卷 16，頁 1A）

由上文可知：何良俊《語林》秉持脩德經世的實用性考量，以德義為根，事詞錯出為敘事的原則，致使文辭有所浮長。何氏於〈言語第二〉的按語，便直言：懼後世典籍之漸亡，舊聞之放失，隨事疏記，故言語不得盡如世語，而與《世說新語》清通簡淡、空靈玄遠的文體風格有所違異。何良俊《語林》文體的規範與支配性因素的形成，一方面將《世說新語》的支配性因素同化於自己的結構中，一方面順應外界信息的不斷刺激與影響，以及個體的編撰意識，對《世說新語》的規範與支配性因素有所變革，在文體建構與解構文體的過程，致使《世說新語》之文體產生轉化。<sup>21</sup>

最後，就《語林》文體支配性規範的移位，對《世說新語》文體的調節而論，何良俊《語林》新增脩德經世的實用性文體支配性因素，取得控制、決定以及改變文體其他支配性因素成分的地位。它打破《世說新語》文體的常規慣例，漸次偏離才性品賞，近娛樂遠實用的支配性規範，導致舊有文體規範系統的變形或解體。何良俊《語林》脩德經世的實用性因素，在文體支配性規範的行列中，與《世說新語》才性品賞，近娛樂遠實用的文體支配性因素產生位移，主從關係亦有所改變。何良俊《語林》突出脩德經世的實用性因素，成為文體新的支配性規範，對《世說新語》文體系統產生調整作用。

何良俊《語林》脩德經世與《世說新語》才性品賞並非對立的關係，只是在文體支配性規範的位置中，兩者各有所偏。以外在形式觀，類目的畫分與措置兩者大同而小異，從中可看出何良俊《語林》因循《世說新語》的跡轍。就敘述方式而論，

<sup>21</sup> 陶東風：〈結構轉化與文體演變〉，《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頁 28-40。

《語林》增廣敘述全知視角的使用，突出講述與整體的敘述方式，使得語體與文學體性有所疏遠，而向史學體性靠攏，對以文學體性著稱的《世說新語》文體有所調節。若將《世說新語》與《語林》兩者之內容，加以細覽，可窺見《語林》才性品賞，近娛樂遠實用的支配性規範的踪影，漸為脩德經世的支配性規範所遮蔽，有隱退的現象。何良俊《語林》除了呈現與《世說新語》相類的才性品賞內容外，脩德經世內容的載記，漸次成為主流，脩德經世的支配性規範作用，頗為鮮明。

何良俊《語林》文體支配性規範的移位，藉由〈企羨〉、〈寵禮〉的文本內容與《世說新語》的比對則更形具體。在〈企羨〉方面，其例如：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帟、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企羨第十六〉，下卷上，頁 631）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企羨第十六〉，下卷上，頁 631）

李元禮獨特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企羨第二十二〉，卷 24，頁 1B）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暨萊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使者與之坐，歷視諸相，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企羨第二十二〉，卷 24，頁 9B）

由上文可見，《世說新語·企羨》所載大多欣慕他人的才性與名望，冀望一己的才性，能為名士所品藻，提昇名望，得列名士之林，此中映現魏晉時期人物品藻的風尚。《語林·企羨》所載記者，於六朝所記因循《世說新語》對個人才性風流之嚮慕的足跡；隋唐以下所記，則為個人文章才德所樂以風從者。何良俊〈企羨〉雖有六朝人物品藻之餘風，但以承繼儒家見賢思齊以進德修業的傳統為主軸，洋溢德性色彩。

在〈寵禮〉方面，《世說新語》所載記為有才情善屬文之士，受到隆禮尊寵的待遇。文中展現對個人才情風姿的推崇，不以名節為高。其例如：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寵禮第二十二〉，下卷上，頁 723）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寵禮第二十三〉，卷 24，頁 16A）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寵禮第二十三〉，卷 24，頁 25B）

由上文可知，《語林·寵禮》的內容，於六朝所載記之故事，依循《世說新語》在上位者俛眉禮賢下士，給於隆禮尊寵的待遇者有之；隋唐以下所載記寵禮之事，則對稟性耿介，或具經世濟民之才士，多所褒揚。《語林·寵禮》雖未全以名節為高，卻展現對君臣道合的追慕，彰著其脩德經世的取向。據上文的分析，《語林》文體不但突出脩德經世的支配性規範，而且具有取決文體性質的關鍵地位。

何良俊《語林》脩德經世的支配性規範，所產生強大的作用，可以華歆、邴根矩、管寧三人為一龍，進一步加以檢證。何良俊於〈品藻第十〉的按語載：

何良俊曰：華子魚輸心異代，大肆戈鋌。邴根矩避難殊方，自露環穎。較之幼安，韜精戢羽，終始令德者，豈可同年而校其優劣哉！篤而論之，當以管為龍頭，邴為龍腹，華為龍尾。（〈品藻第十〉，卷 18，頁 4B）

《世說新語》對三人為一龍的品藻，依三人之才性與名望為準的，列華歆為龍頭，管寧為龍尾。《語林》則以管寧終始令德，由龍尾擢升至龍頭，華歆則以輸心異代，事二姓，而遭貶為龍尾。三人一龍品位的變動，昭明脩德經世的支配性規範在《語林》的文體中具有優先性。再次證明才性品賞遠實用的文體支配性規範與脩德經世的支配性規範，的確產生位移，而且《語林》脩德經世支配性規範地位的躍升，對《世說新語》文體產生轉化的作用。

何良俊依仿《世說新語》編撰《語林》，在經世為經、適性為緯、脩德為基調的編撰意識下，樹立脩德經世的支配性規範，與《世說新語》文體產生一種同化與順應的關係。在建構與解構中，對《世說新語》形式規範、結構方式、題材內容、描寫對象以及語言形式有所調整，形成文體的創造性轉化。此一轉化是一種漸變的狀態，是屬於《世說新語》文體內部的調整。

## 五、結語

一個文體特徵之所以能被後代作家不斷的模仿，必然具有一定的慣例性、權威性和普遍有效性。考察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因革，與其說是顯示何良俊《語林》的個性，還不如說是要概括世說體族群的共性。《語林》在經世為經、適性為緯、脩德為基調的編撰意識下，樹立脩德經世的實用因素為文體的支配性規範，帶來明代「世說體」近實用遠娛樂的徵實之聲。明代後期世說體創作，以回歸傳統史傳徵實的紀事目的為主流，強化垂訓的內容題材，展現鮮明的名教與歷史意識，已然逐漸遠離《世說新語》「遠實用而近娛樂」的文體性質。任何一種文體既是特殊的表達方式，也是特殊的文化存在方式。明代「世說熱」的產生是晚明、魏晉兩個朝代，時空近似，精神相通的產物，但在文體的轉化中折射出差異與變化，透露出相異的價值取向以及審美訴求。

## 引用書目

### 一、原典文獻

明·何良俊：《語林》，收入於新興書局編：《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十七編，臺北：新興書局，1984。

明·王世貞編，張文柱校：《世說新語補》，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萬曆 13 年張氏原刊本。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吳瑞徵刊刻之巾箱本。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3。

### 二、近人論著

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申丹：〈文學文體學的分析模式及其面臨的挑戰〉，《外語教學與研究》3（1994），頁 7-13、80。

吳智和：〈何良俊的史學〉，《明史研究專刊》8（1985.12），頁 1-98。

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臺北：里仁書局，2004。

張雅函：《何良俊〈語林〉之文化意蘊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劉強、吳寅：〈《世說新語》文體考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2005），頁 113-120。

劉偉生：〈世說體研究的文體學意義〉，《學術界》3（2009.5），頁 194-199。

鄭幸雅：〈論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的文化意蘊〉，收入於殷善培主編：《文學視域》，臺北：學生書局，2009，頁 538-546。

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文學新鑰》10（2009.12），頁 105-166。

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

〔英〕雷蒙德·查普曼著，王晶培審譯：《語言學與文學》，臺北：結構出版群，1989。

